

大都市边缘区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及效应评价 ——以长沙市望城区为例

贺艳华^{1, 2} 谭惠敏¹ 康富美¹¹

(1.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在解释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机制的基础上, 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空间效应 4 个维度, 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了 2003—2018 年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过程, 提炼出其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并评价该模式下城乡融合发展效应。研究表明: 望城区城乡发展同步推进, 探索出了城—镇—村三级共推、产业—空间—制度多维协同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效应整体上较强, 尤其在经济效应方面较为突出, 不过, 早期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不够, 导致生态效应呈下降趋势, 城—镇—村的联动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乡村产业特色优势也有待进一步强化。建议统筹编制城镇村发展规划, 切实保护城乡生态环境, 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发展。

【关键词】: 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 城乡地域系统 发展模式 效应评价 大都市边缘区

【中图分类号】: F252.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5-0156-09

长期以来, 受“二元结构”体制影响,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农业经济发展滞后, 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环境污染、空心化、劳动力流失等“农村病”突出^[1-3]。为此, 国家先后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来协调城乡发展, 也取得了较大进展。2019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60.6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2358.8 元和 16020.7 元, 不过, 二者比值仍高达 2.64。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表现。为此, 重塑新型城乡关系,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近年来, 我国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做出许多积极尝试, 初步形成了一套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但距离融合发展目标依然还有较大差距。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为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 怎样才算“见实效”, 如何推动“见实效”, 成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解的重要议题。科学评估城乡融合发展效应, 探寻高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是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

近年来, 关于城乡融合方面的研究日益丰富, 其研究内容涉及城乡融合的内涵、水平测度、时空格局演变、影响因素与机制、发展模式与调控路径等方面。学者们多从城乡要素互动、“流”空间、城乡等值化、空间均衡等方面理解城乡融合^[4-6], 从社会、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0JJ4056);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19A333)

作者简介: 贺艳华 (1982—), 女, 湖南宁乡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乡转型与区域可持续发展。E-mail: zlgx888@163.com

经济、生态、空间、人等多维度^[7-8]构建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从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以及两者相互作用关系探索城乡融合的驱动机制^[9-12]。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探索，地方层面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模式，比如苏南“乡镇企业带动”模式，珠三角“以城带乡”模式，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模式，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成都“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模式等^[13]；学者们也结合地方实践，分别从空间组织^[14-15]、发展动力^[16-18]、资源禀赋^[19]等视角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进行了理论归纳与提炼，并从制度创新驱动、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城乡信息文化交流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调控措施与发展路径^[20-21]，不过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但是，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地域性和多尺度性，不同地区、不同尺度所适应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应有所不同，目前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提炼仍远远不够，对不同模式的效应评价与思考也有待加强。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解释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机制的基础上，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空间效应4个维度，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望城区为例，分析其城乡融合发展过程，提炼其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并对该模式的推行进行效应评价，提出后续调控建议，试图揭示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机制，并建立效应评估框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理论。此外，望城区属于中部城市长沙大都市边缘区，城乡要素流动频繁、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较快，同时城乡冲突也较激烈、城乡关系较复杂，深化对该类地域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与效应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为同类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1 城乡融合发展内涵及效应机制

1.1 城乡融合发展内涵

城乡融合就是要在城乡互动发展过程中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公共服务均衡、生态和谐共生、生活质量等值化^[22-25]，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福祉共同提升，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26]。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将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城乡要素的流动、城乡空间的优化、城乡功能的互补与城乡制度的创新，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空间、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一体化与和谐共生^[27]。城乡融合的过程是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重塑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系统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逐步优化配置并实现自由流动，城乡社会、空间、产业、治理的多维耦合结构逐步形成，城乡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实现有机融合。城乡融合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人地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城乡融合阶段特征也有所不同。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乡村发展的活力、动力与韧性能力^[28]，而要实现城乡融合首先必须补齐乡村短板，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

1.2 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机制

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就是要通过城乡要素流动、空间优化与功能整合，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从低效转为高效、空间秩序从无序转为有序、社会文化从割裂转向和谐、公共服务从非均衡转为均衡、生活质量从差异转为均等，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要求深入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机制。

城乡地域系统是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受多元主体影响、形态与功能多样的复杂系统，其有序化、高效化、均等化的转化过程受政府、企业、城乡居民及一些非正式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推动^[29]。政府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参与者，对城乡发展方向、要素流动、乡村建设行动等起着关键性的调控和引导作用；企业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为乡村发展带去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城乡居民为本，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内在动力；一些非正式组织与政府、居民一起参与城乡治理。

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过程实质上是各类利益主体在高效、均衡、共治、共享、可持续的行动范式引导和规制之下，共同促进

城乡基础设施的统筹建设、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协同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集聚与扩散是推动城乡融合过程演化的动力机制，冲突与协同则是伴随集聚与扩散而产生的效应机制^[30]。在城乡利益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以及各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城乡之间集聚与扩散^[31]。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城乡资源与要素再分配的过程，利用城乡资源的异质性和功能互补性可以缓解当前存在的一些城乡冲突，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城乡主体之间的竞争和新的冲突的发生。城乡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在不断地、高频率地、多方位地发生着，城乡系统地冲突与协同也在反复地、短周期地、分散式地演化着。

在两大机制的共同推动和相互约束下，城乡的形态与关系不断发展变化，城乡系统也不断从无序结构向有序结构演化，城乡融合逐步向更成熟的阶段演化，并促进着城市与乡村的同步发展。在此过程中，城市对周围乡村地域产生非农化转化、经济辐射、文化渗透等多重效应，并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先进的技术支撑、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服务功能等，从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品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增强农村吸引力与活力、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32]；与此同时，乡村地域为城市提供高品质农产品、乡村文化服务、生态休闲服务、土地利用空间，既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或更高层次需求的休闲空间，也为土地成本高的企业提供了向周边农村地区转移的机会，从而在更好地保障城市居民健康的同时，优化城市劳动力供给和配置^[33]，加快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更新^[34]，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社会环境。综上所述，城乡融合发展通过物质空间重构、文化观念渗透、资源要素流动，促进城乡地域系统的协同转型与发展，从而共同提升城乡居民福祉，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历程与模式分析

2.1 望城区概况

望城区隶属于湖南省长沙市，地处湘中东北部，横跨湘江两岸。2011 年撤县设区，现辖 11 个街道、5 个镇，土地总面积 969km²。该区是长株潭城市群沿江北上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桥头堡，也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湘江新区建设等多重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截至 2019 年底，全区总人口 72.5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47.69 万人，城镇化水平为 65.72%，人均 GDP 达到 116353 元。与此同时，借助大都市边缘区的区位优势，依托其优越的生态资源、可塑的国土空间，望城区“融城”步伐加快，城乡转型迅速，率先在全省实现镇村规划全覆盖，建成覆盖城乡的全域交通网络，城市供水、供电、通讯、污水处理、“三网融合”等配套设施向农村延伸。2019 年底，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213.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05.7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46，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 2.59。目前，该区新型城乡关系格局已基本形成，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走在湖南省乃至中部地区前列，探索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望城模式”，在融城发展的过程中，加快了中心城区的更新提质，而与此同时，也很好地促进了乡村的多功能发展，保护了乡村的地域特征。未来，如何更好地延续这种城乡共生模式，促进城乡可持续融合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2.2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21 世纪以来，国家为破解“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战略相继提出，党的十六大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些战略及有关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图 2）。

在国家城乡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望城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03 年，望城提出“融城强县、园区兴工”战略，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乌山创业富民基地、丁字物流产业基地、望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望城经开区等园区陆续成立，2004—2006 年期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农村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06 年底，

全区城镇化水平 34.69%，工业总产值 48.05 亿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11632 元、5265 元。2007 年开始，望城全面实施“工业兴县、城乡统筹”发展方针，在利用长株潭城市群“两型”试验区建设政策优势加快园区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了通村入户路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供水、污水处理、有线电视等配套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城乡电网改造基本完成，率先在全省开通天然气，邮电通信等其他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也逐步发展起来，特种水产养殖和休闲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以白箬光明村为代表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以靖港镇为试点的古镇复兴工作开始展开，城乡面貌有所改观。到 2010 年底，全区城镇化水平达到 46.17%，工业总产值 131.45 亿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1294 元、10574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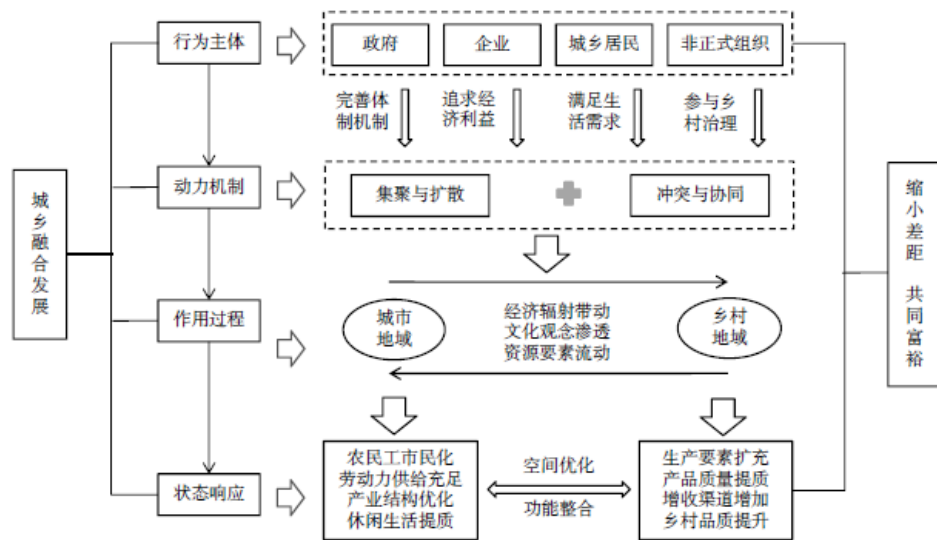


图 1 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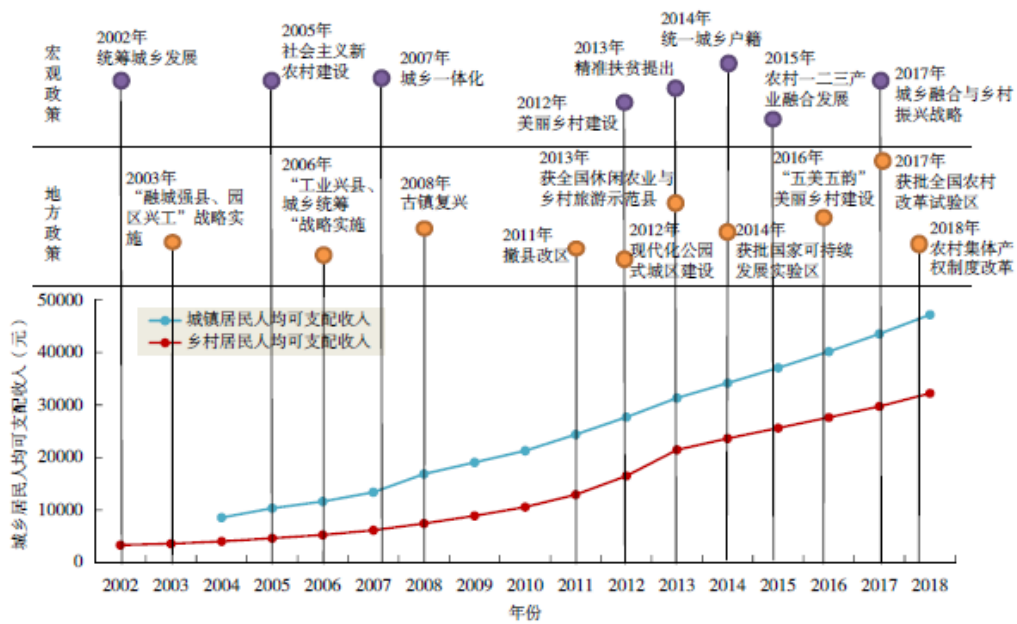


图 2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2011 年，望城完成撤县改区，区域发展步入新的阶段。随着滨水新城建设的推进，望城区中心城区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对村镇的带动辐射作用也逐渐增强。2012 年望城区出台了《关于加快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城乡一体化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随后，依托城乡一体化建设工程的推进，逐步形成了靖港古镇、乔口渔都、铜官陶城、新康戏乡四大特色古镇发展格局，开展“美丽庭院”和“美丽村落”创建，建设了一批湖湘特色的村落。到 2015 年末，望城区基本实现了镇村规划全覆盖，形成了以总体规划为主体、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各类专项规划为纽带的城乡规划体系。此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也日趋完善，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全域交通。“十三五”以来，望城区加大力度建设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打造“五美五韵”美丽乡村，推行乡镇“一镇一特”发展模式，镇村品质得到了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差距也逐渐缩小，城乡融合发展成效较为显著。此外，在严格落实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任务过程中，望城区积极探索脱贫增收的长效机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乡村旅游和电商平台，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保障了贫困群众的多元化收益，脱贫任务圆满完成，进一步缩小了城乡贫富差距。2019 年底，全区城镇化水平达到 65.72%，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51213 元、35106 元，人均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46，在全省 111 个县市区中排第 6（从小到大排列）。

2.3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特征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借助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湘江新区建设以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政策优势，望城区城乡发展同步推进，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共同建设，产业、空间、制度多元协同，探索出了一种“城—镇—村三级联动、产业—空间—制度多维协同”的城乡融合发展全域多维统筹模式。

2.3.1 城—镇—村三级共推

从城乡融合的空间组织过程来看，望城区以中心城区建设为核心、以特色城镇建设为纽带、以村落建设为节点推进城乡全域统筹发展。一是以滨水新城为建设重点，加快中心城区建设，推进高星、河东、大众垸三大板块开发，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动力支撑。二是实施“一镇一特”工程，提升特色小镇品质，打造了以靖港古镇、乔口渔都、铜官陶城、新康戏乡为代表的湘江古镇群落，发展特色小镇旅游，为当地居民提供创业就业机会，为城乡合作交流发挥纽带作用。三是积极建设新型农村，通过“美丽村落”建设行动，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乡村品质，打造了光明村、彩陶源村、银孔围组等湖湘特色美丽新村。

2.3.2 产业—空间—制度三维协同

从城乡融合的内容来看，望城区强调以空间重构为支撑、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以制度改革为保障，促进城乡空间、经济、制度的多元融合。首先，构建新型居民社区，建设产业园区，实现生产生活空间重构，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物质空间基础。一方面，建设“拆迁安置限价商品房”以促进农民城镇化进程，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另一方面，统一进行新村的规划建设，强化新型乡村社区建设和管理，实现居民居住的社区化。同时，通过经济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循环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吸引企业入驻，构建产业发展平台，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其次，依托工业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强化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实现城乡产业重塑，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城乡产业融合的重点，带动民居改造、文物保护、交通建设和公共配套设施增设等一些旅游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发展环境；推动工业园区的建立，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产业等，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园区的建成环境，带动城乡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村集体土地改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合理优化配置，为城乡融合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比如，通过推进撤镇改街、撤村改居、合并村组等乡镇机构改革和“城中村”改造，进一步完善了城乡社会治理体系；推广村级土地经营权股份制，加速土地流转，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培养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推行“公司+基地+农民专业社+农户”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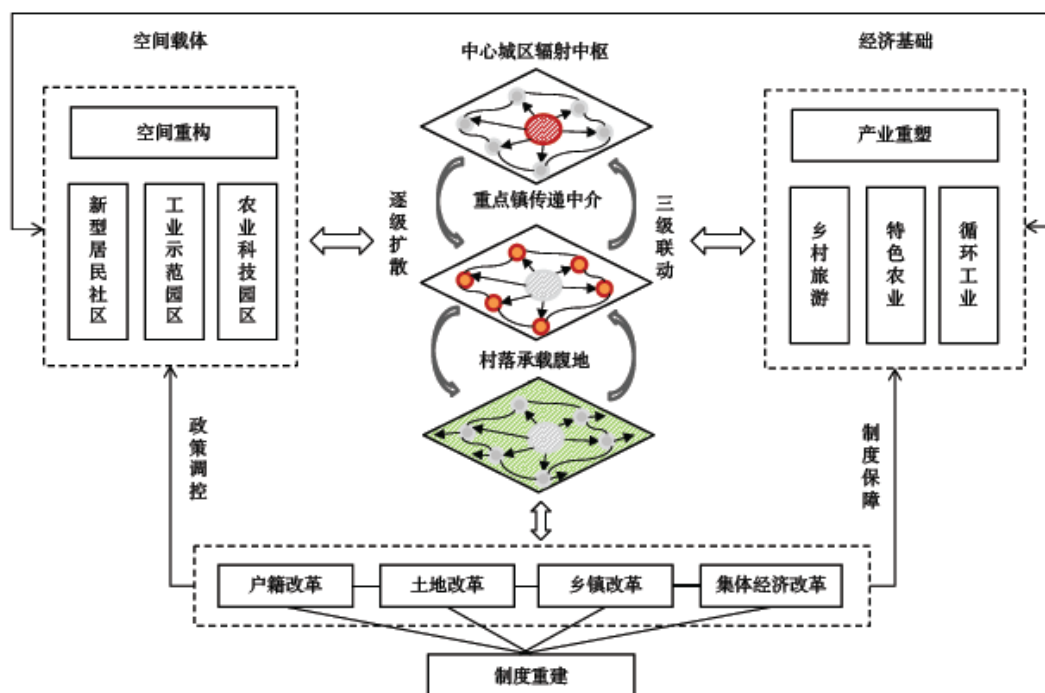


图3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全域多维统筹模式

3 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评价

3.1 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评价必须紧扣城乡融合发展内涵及其效应机制，强调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体现“缩小差距、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为此，可以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空间效应四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既考虑反映城乡差距的对比类指标，又考虑反映城乡共同发展的状态类指标。

3.2 效应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综合评价的指标赋权方法有多种，目前使用得比较多的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方法和客观赋权方法两大类。主观赋权方法主要凭借赋权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赋权，客观赋权方法主要根据数据之间的相关性、离散性等来确定权重。基于以上两大类赋权方法各自的优点与局限性^[36]，本文采用客观赋权与主观赋权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各指标最终的综合权重，客观权重采用熵值法^[36]和主观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37]。

为了保证指标的客观合理性，选择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与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各占50%来最终确定各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

3.3 综合效应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加权线性求和对各指标进行综合测算，从而得到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效应综合得分，其公式如下：

$$F = \sum_{i=1}^n Q_i P_i$$

式中：F 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效应综合得分值； P_i 为第 i 个指标的综合权重值； Q_i 为第 i 个指标标准化值； n 为评价指标的个数。

3.4 数据来源及处理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城乡关系开始转向城乡统筹发展，而望城区也开始提出“融城”战略，本文以 2003 年为起始研究时点，对望城区 2003—2018 年城乡融合发展进行分析。研究数据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道路交通网络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根据《湖南统计年鉴》（2004—2019 年）、《长沙统计年鉴》（2004—2019 年）、长沙市望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18 年）以及各乡镇统计公报整理所得。城乡建设用地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与量级。

3.5 效应评价结果分析

3.5.1 综合评价

2003—2018 年期间，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图 4），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效应指数由 2003 年的 0.3285 提高到 2018 年的 0.7619，增长了 1.32 倍。其中，2003—2011 年，城乡融合发展效应逐步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效应指数从 0.3285 增长到 0.4980，增长了 0.52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5.34%，主要是在融城强县、园区兴工等战略的推动下，全区城乡经济在整体上得到了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2011—2015 年，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迅速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效应指数由 0.4980 增长到 0.7235，增长了 0.45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9.79%，主要是随着城乡一体化管理机制的完善、城镇村规划体系的落实、湘江古镇群的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设等，村镇品质得到全面提升，城乡发展步伐加快。2015—2018 年，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提升趋缓，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效应指数由 0.7235 增长到 0.7619，年均增长速度为 1.74%，主要是由于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趋于平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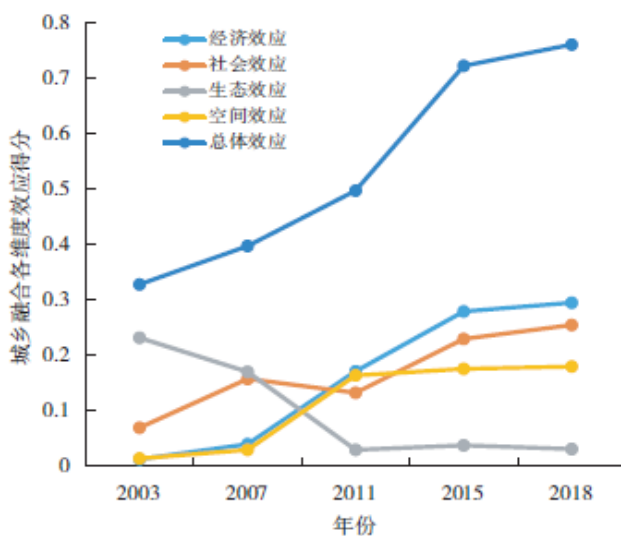


图 4 望城区 2003—2018 年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评价结果

3.5.2 分维评价

经济效应方面,人均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9870元增加到2018年的103407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12下降到1.46,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区城乡融合经济效应指数由2003年的0.0126增加到2018年的0.2955,年均增长速度为23.41%,增长趋势超出社会效应和空间效应,尤其是2007—2015年期间增速明显。由此可见,产业园区建设与城乡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不仅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

社会效应方面,通过特色城镇建设、工业园区及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了周边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农村医疗服务、教育、文化、信息化、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社会效应总体呈平缓上升趋势,城乡融合社会效应指数由2003年的0.0696提高到2018年的0.2552,年均增长速度为9.05%。

生态效应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差异。2003—2011年期间,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关注不够,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土地非农化的过程中,乡村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破坏,城乡融合生态效应呈快速负向增长,生态效应指数由0.2322下降到0.0297。2011年以后,城乡生态环境建设逐步被重视,城乡融合生态效应趋于平稳,生态效应指数在0.0297~0.0311之间波动。

空间效应方面,2003—2007年期间,城乡融合空间效应不是很明显,效应指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期间,在乡镇区划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因素的推动下,城乡空间组织发生了较大变化,城乡融合空间效应指数迅速增长,由2007年的0.0296增加到2011年0.1641,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3.45%;2011年以后又趋于平稳。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城乡融合就是要在城乡互动发展过程中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公共服务均衡、生态和谐共生、生活质量等值化,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福祉共同提升,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实现城乡融合首先必须补齐乡村短板。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就是要通过城乡要素流动、空间优化与功能整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城乡融合发展效应可以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空间效应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望城区位于长沙市大都市区外围,其新型城乡关系格局已基本形成,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走在湖南省乃至中部地区前列。该区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乡发展同步推进,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共同建设,产业、空间、制度多元协同,探索出了一种“城—镇—村三级共推、产业—空间—制度多维协同”的城乡融合全域多维统筹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据效应评价结果可知,该模式的综合效应整体较强,尤其是经济效益较为明显,不过早期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不够,导致生态效应呈下降趋势。

4.2 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阶段,大都市边缘区成为高度敏感和充满活力的地区,也是支撑大都市空间架构、承载城市新功能成长的战略场所,城乡关系相对复杂多变,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当然,望城区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城—镇—村三级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三者之间的联动机制依然不强,其联动效应和叠加优势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早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导致乡村生态本底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降低了综合效应;园区兴工的后续动力不足,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也面临优势资源深挖与特色强化问题,使得后期成效不够显著。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①从区域整体层面思考城乡融合发展策略,更好地统筹城镇村多级规划,形成融合发展的规划合力,优化城乡空间组织,促

进田园乡村、特色城镇和现代都市的协调发展；②切实提高城乡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按照物质空间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对农村生态景观和传统地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并针对有必要的地区开展生态修复工作；③增强产业园区的集聚带动效应，有效引导周边产业向园区集中，促进产业的融合集聚发展，在加强内部各园区之间的产业关联和功能混合的同时，加强与外部园区的合作，通过企业合作加速知识共享、资源流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主导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④提高农业科技投入比重，加强涉农科技创新，发掘望城区特色资源，强调本土性和文化性，拓宽特色产品消费流通渠道、加强品牌化建设，完善农村产业经营主体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 [1]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 (4) :637-650.
- [2]张新林, 仇方道, 朱传耿. 时空交互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演化[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 (8) :1867-1880.
- [3]Liu Y S, Chen C, Li Y R.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at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 (9).
- [4]杨志恒.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内涵与机制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 (4) :111-116.
- [5]谭鑫, 曹洁. 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集聚效应及地区差异比较——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7) :44-52.
- [6]叶超, 陈明星. 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启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1) :34-39.
- [7]窦旺胜, 王成新, 蒋旭, 等.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山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19, 42 (6) :1-8.
- [8]谢晖, 胡畔, 王兴平. 大都市边缘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评估——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 (1) :66-71.
- [9]车冰清, 朱传耿, 仇方道. 淮海经济区城乡空间融合格局及形成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 (8) :1897-1907.
- [10]周佳宁, 毕雪昊, 邹伟.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 (8) :1881-1896.
- [11]刘融融, 胡佳欣, 王星. 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7 (6) :106-118.
- [12]张果, 任平, 周介铭, 等.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6 (6) :33-36, 42.
- [13]鲁长亮, 唐兰. 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与策略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 (3) :1585-1587.
- [14]黄伟雄. 珠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与格局的探讨[J]. 经济地理, 2002, 22 (3) :335-338.

-
- [15]李习凡,胡小武.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0(9):70-75,91.
- [16]马晓强,梁肖羽.国内外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模式的评价和借鉴[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24-29.
- [17]鲁能,白永秀.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贵州社会科学,2013(7):90-96.
- [18]郭美荣,李瑾,冯献.基于“互联网+”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探究[J].中国软科学,2017(9):10-17.
- [19]任保平,邓文峰.西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功能分类模式及其实现途径[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2(3):149-153.
- [20]杨园园,臧玉珠,李进涛.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J].地理研究,2019,38(3):684-698.
- [21]王开泳,陈田,王丽艳,等.半城市化地区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模式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县为例[J].地理科学,2008(2):173-178.
- [22]宁志中,张琦.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J].地理研究,2020,39(10):2201-2213.
- [23]马晓冬,李鑫,顾晓波,等.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8):1853-1866.
- [24]张英男,龙花楼,马历,等.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地理研究,2019,38(3):578-594.
- [25]周国华,刘畅,唐承丽,等.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12):2475-2489.
- [26]贺艳华,邬建国,周国华,等.论乡村可持续性与乡村可持续性科学[J].地理学报,2020,75(4):736-752.
- [27]贺艳华,周国华,唐承丽,等.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理论初探[J].地理研究,2017,36(2):241-252.
- [28]李玉恒,黄惠倩,王晟业.基于乡村经济韧性的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以河北省典型县域为例[J].经济地理,2021,41(8):28-33,44.
- [29]He Y H,Zhou G H,Tang C L,et al.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An Agglomeration-Diffusion Analysis of the Population and Firms[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9(87):54-65.
- [30]贺艳华.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 [31]He Y H,Lin Yi,Zhou G H,et al.Spatial pattern and driver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mid-level developing urban agglomeration:A case study of Chang-Zhu-Tan[J].Regional Sustainability,2021,2(1):83-97.
- [32]周国华,戴柳燕,贺艳华,等.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19):242-251.

-
- [33]贺艳华, 邓凯韶, 唐承丽, 等. 长株潭城市群城乡人口流动特征及动力机制[J]. 经济地理, 2017, 37(1):74-81.
- [34]贺艳华, 刘聪, 周国华, 等. 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测度及其差异[J]. 热带地理, 2021, 41(2):327-339.
- [35]宋冬梅, 刘春晓, 沈晨, 等. 基于主客观赋权法的多目标多属性决策方法[J]. 山东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5, 45(4):1-9.
- [36]何秀丽, 程叶青, 马延吉. 东北粮食主产区城乡协调发展综合评价——以长春市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0, 31(6):724-728.
- [37]李秉文. 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评价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2, 33(3):65-69.